

平顶山事件

(日)本多胜一

当驻越南美军在越南犯下屠杀全体居民的索米事件、巴兰阿事件被公布于众时，一般的日本人都会联想起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行。本书涉及到的南京事件，也许是因为远东军事裁判时提到了，所以在日本成为一般性常识为人所知(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却无人知晓)。如果要举出日军所犯下的与索米事件类似的大屠杀的例子，与其说南京事件，不如说在此以前就发生了的抚顺平顶山事件更为合适。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在索米事件报道之时，能把它与平顶山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人，除了直接关系者外，绝无仅有。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平顶山事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本书的《潘家峪惨案》中作为典型而提到的“三光政策”这一众所周知的作战方式，是象征着日军的末期已经来临时有组织进行的。但是，在本质上完全相同的惨无人道的虐杀事件，早在日中战争的初期阶段，即“九·一八”事变(日本方面称为满洲事变)的第二年，即1932年就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抚顺郊外的平顶山事件。我采访了事件爆发时奇迹般生存下来的极少数村民当中的三个人，向他们询问了当

时的情况。其中最年长者夏廷泽详细地介绍了全部过程，然后，韩树林和赵树林又进行了补充。他们三位都是煤矿工人，以不平静的心情讲述了事件的经过：

1932年的阴历8月15日，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义勇军游击队，袭击了日军占领下的抚顺煤矿。游击队袭击后就立即撤退了。日军为了报复，把游击队进攻之前曾经集结过的地区，即平顶山一带的居民，统统戴上“与共匪勾结”的罪名，实行了全部杀光的政策。第二天，黎明来临时，三辆卡车运来日本兵，把约400户3000余人的村落包围了起来。

我们站在平顶山西侧的山坡上，一边俯视当时事件发生的现场，一边在雨中听夏廷泽为我们叙述当时的情景。

日本兵分三路散开，包围了村庄。间隔两三尺排成一列，端着刺刀，把村民们赶向西侧的山崖下。缠足的老太太摇摇晃晃走不动，就被他们用刺刀捅死、母亲呼唤孩子，孩子呼叫母亲，悲惨的哭声震荡了整个村庄。

村民们都被赶到了西面的山崖下，这里曾经是日本人的牛奶场。山崖下边由于工事运土而形成一片浅洼地。士兵们朝着被赶来的村民们打着手势，命令道：“坐下，都坐下”。村民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整个地面黑压压地都被人群覆盖住了。这时，一辆卡车出现在人们面前，车上的机关枪搬下来了，并排摆在地上。日军朝着山崖下密集的人群疯狂地扫射。

夏廷泽向我们展示了他当时被机关枪打伤的胳膊上的伤疤。当机关枪开始射击时，夏廷泽和他哥嫂坐在一起。夏廷

泽坐的地方稍微低点 就朝他哥哥说：“往这边靠点。”他说：“我哥哥刚要站起身时 被子弹射中头部 当场就死了。我嫂子惊呆了，她抱着我哥的尸体不松手。哥哥被打死的刹那间，他那刚满 20 个月的孩子掉在地上，我伸出左手抓住他，把他抱起来。就在这时，两只胳膊被子弹射中了。由于过份紧张，几乎没感觉到疼。我用右手紧紧地抱住孩子，朝着南面的洼地跑过去。”大概有五六个人拼死地穿过洼地 除了夏和另外一个轻伤员外，其他几个人都因伤势过重很快就死了。逃到豆子地里的夏廷泽，抱着孩子爬在地上，等待天黑。从屠杀现场跑脱的只有几个人。

屠杀现场现在已变成一片树林。知了在叫。那时村民们在机枪的扫射下倒成一片，尸体压在一起。其中有些人没被打死，也和尸体一起倒下。鲜血染红了大地，惨不忍睹。估计有一半人被打死后，机枪突然停止了扫射。日军吹起了哨子，作出要撤走的样了。活着的人本能地一下子站起来，要逃走时，哨子又响起，机枪又重新开始扫射。

第二遍机枪扫射之后，士兵们端起刺刀，踏上死尸，用刺刀挑，用靴子踢，寻找是否有生存者。哭叫的孩子都被他们刺死了。那些躲过机枪扫射的人，也几乎都被杀死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奇迹般地逃脱虎口的极少数生存者，这里边除夏廷泽外，还有当时还是少年的韩树林和赵树林。大屠杀现场附近，现在已铺通了道路。在道路旁边，至今仍能挖出牺牲者的遗骨。

“我们挖一下看看”夏廷泽他们在路边用手挖着土。突

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块块、各种部位的骨头。多数是孩子的胸骨，在雨中，手里拿着幼儿的骨头，夏廷泽他们不禁又流下了悲痛而愤恨的泪水。

为纪念这一悲惨事件，在西侧的山坡上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在这座碑的背后的纳骨堂里，安放着村民们的遗骨。由于收容不下，只安放了一小部分。

殉难纪念碑前站着三位证言人：赵树林、韩树林、夏廷泽。当时把赵树林紧紧抱在怀里的赵的母亲，被机枪打伤后，又被鬼子从背后用刺刀捅死了。赵树林藏在母亲的尸体下，躲过黑夜，趁天亮之前逃到矿工宿舍，才算留下这条命。

大屠杀的第二天，日军用卡车运来石油，浇在用尸体堆成的山上，大火一直烧到当天夜里，散发着浓烈的臭焦味。一些受了重伤但还活着的人，也被活活烧死了。几天以后，日军用炸药把山崖炸塌，把惨遭虐杀的尸骨埋了起来，企图销毁罪证。3000多村民，就这样被日军残暴地杀害了。逃脱者仅有十来个人，成了孤儿的韩树林和赵树林只好去流浪乞讨。

被埋起来的尸体现场，在我去采访后不久，就被挖掘出来。盖起了供参观用的屋子。现在去参观时可以看到许多当年死难者的遗骨。

（晓 光泽）

“矫正院”及日军统治下的黑暗世界

(日)本多胜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世界上仍存在着很多旧殖民地。日本的殖民地包括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即所谓的“满洲”）。……伊藤正孝的报告文学《南非共和国的内幕》（中公新书）描述了一个少数白人残酷压榨黑人的血淋淋的世界。当年，侵华日军制造了一个同样的或者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世界。

第一部《平顶山事件》的报道，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后，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些人说，他们对虐杀事件过去毫不知晓表示反省和惊愕。也有少数人来信说：“这是中国方面捏造的。”在去过中国东北地方的许多日本人当中，也有人认为这是“无法相信”的。一挖就能挖出这么多幼儿的遗骨，单单这一事实就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不是捏造出来的谎言！

其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南部及波斯顿附近的“上层”家庭中，在“自由”和“民主主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他们不可能了解卡斯坦将军把印地安村里的妇女儿童统统杀光的事实真相。西贡的法国人的“优雅家庭”中的小

姐、先生们，也不可能“知道”殖民地统治下的越南人受到怎样残酷的镇压。

奉天（现在的沈阳），曾有几十万日本人单独的居住区。这些以征服者的特权，过着“和平”生活的“善良的日本人”，对以下所介绍的“矫正院”的生活，对中国东北父老乡亲们的种种灾难，也会觉得“难以相信”。他们可知道，正是有了像“矫正院”和东北人民这样的灾难，他们的所谓“和平”生活才能够得以保证。

我认为，即使是那些亲眼看见中国人民在受苦受难的日本人当中，也有许多人无法想像中国人的世界。正像对北美的一般中高阶层的人来说，即使是直接看到受压迫的黑人和墨西哥族市民的悲惨生活，他们也无法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一样。因为对剥削者、侵略者、压迫者来说，眼里就根本没有被剥削者、被侵略者、被压迫者的“存在”。

1937年由住友财团在沈阳建造的机床厂，现在已发展成现代化的大工厂。伪满洲国时的住友工厂，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惩罚“犯人”的劳动场所。在这里劳动的工人，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工，给日本人的守卫敬礼，从给中国人专设的门进去。宿舍、食堂都是和日本人分开的。领到的工资低得连一个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工厂里，没有一个日本工头不打中国工人的，也没有一个中国工人没挨过日本人的打。工厂的大门旁边，有一棵柳树，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这里就是拷打工人的刑场。日本工头经常把工人反捆上手，吊在树上拷打。证言者之一马桐林告诉我：一天，一个叫“川本”的

日本警备长，把一个工人绑到这棵树上，用鞭子一直打得晕死过去，然后用冷水把他浇醒，送到郊外的警察局，像这样被送走的工人很少有人能平安地回来。还有一个工人，被“川本”打得晕死过去后，扔在寒冷的雪地里，被活活地冻死。

这种用来拷打工人的柳树，在鞍山的铁管铸造厂里也见到了。伪满时叫“久保田铸造”。当时究竟发生了多少悲惨的情景，柳树就是历史的见证。

久保田铸造工厂的中国工人们，每天从大门口旁边的一个小门出入，早起晚归。每天早晨都被迫向供在这里的日本人的祠堂祈祷，忘记了就要当场挨打。下班的时候，还要全体在这里接受搜身检查。搜查是否有人把工厂里的东西带走。不管是雨天还是雪天，都要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检查。胡殿录就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

当童工的胡殿录，一天，在接受搜身检查时，突然，一个叫“富士森”的日本看守大骂道：“你这个小偷，把他从队里拽出来。”“富士森”挥起拳头用力把他打倒在地，又用靴子踢他，顿时他血流满脸。他这个年龄在日本应该是读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当时，站在他身后的父亲，一个劲地向日本人解释，孩子口袋里的钉子不是偷的，只是忘记把剩下的钉子拿出来。于是，“富士森”更加变本加厉，把他父亲也拽出来，用棍棒使劲打他的头，昏倒在地的父亲又被“富士森”朝腰部和腹部乱打一阵。父亲嘴里流出鲜血，晕死过去，到第二天早晨也没苏醒过来，惨死在家中。

抚顺煤矿的红旗矿副主任刘振山，背上有一块很大的烧

伤痕迹。1943年9月的一天，还是童工的刘振山正在坑内干活，坑道里突然发生了瓦斯爆炸。刘振山正在离坑道出口不远的地方，坑道里都是烟，他趴在地上，爬了出来，但背上被烧伤了。日本人站在坑道入口附近，命令中国人首先把马达和传送带从坑里搬出来。机械搬出来后，竟不顾坑里还有6名中国人，就把入口封闭了。这种处置方法是瓦斯爆炸时司空见惯的做法。刘振山他们是前一年的二月被强行抓到煤矿当劳工的。一起来的同乡有40人，到日本投降时，活下来的只有6个人。

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公布了治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到处设立了“矫正院”。三个人聚在一起说话就被视为政治犯，吃白米饭就视为经济犯……许多中国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矫正院”。抓进来的人有的因为恶劣的环境和腐烂的食物而生病，有的被拷打致死。因此，“矫正院”周围的居民编了这样的歌谣：

矫正院是阎王殿，
活着进去，
死了出来。
失踪者数不清，
白骨堆成山。

那些因为生病和被拷打致死的中国人，被集中扔到“矫正院”前边空地上挖的坑里。尸体上的衣服被剥光，因为没用土掩埋好，就被野狗撕食。现在，扔死尸的地方变成了田

地。但是，还经常能挖出牺牲者的骨头，解放后，有些人将挖出来的骨头集中起来埋葬到墓地里。但是几千名牺牲者的骨头是挖不尽的。

“矫正院”悲惨的事例很多。

年近七十的孙助金，她的丈夫就是当年被当作“经济犯”抓进“矫正院”的。他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旅馆，住客可以自己做饭。一天，两名住店的客人做了大米饭，被巡查发现后，把两个客人和她丈夫一起抓到“矫正院”。两个客人不久就因严刑拷打，先后死去。她丈夫也得了病。为了把丈夫救出来，她把所有的家具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凑了 700 元钱，在丈夫被关进“矫正院”7 个月后，才把他赎了出来。丈夫出来后半年卧床不起，两个孩子也在丈夫被关期间因饥饿而接连死去。

平时做点小买卖的栾凤鸣，1944 年的夏天，在街上卖烟时路过“矫正院”，一个日本职员向他要 5 盒烟，当栾凤鸣向他讨钱时，他翻脸说：“你跟我来”，把栾凤鸣带进“矫正院”，骂道：“你不是要钱吗？给你这个”，说着就动手打他，别的日本人也用铁棍打他的头，栾凤鸣当场晕倒过去。他们用冷水把他从头到脚浇得湿透，然后赶出门外。香烟被全部没收了。第二天，日本巡查来到他家说：“昨天你得罪了日本人，要支出 50 元钱，否则就送你去‘矫正院’”。没办法，栾凤鸣只好千方百计地凑够钱交上去。

王淑琴，当时住在“矫正院”的旁边。一天，亲眼目睹一个中国人想从地狱般的“矫正院”逃走，被抓住后，绑在

铁丝网旁边的木头上。日本人拿来开水浇在那个人头上，然后用一把短刀，从头顶切开，开始向下剥皮，那个人发出惨叫声，不一会儿，就昏死过去。皮一直被剥到脸部，惨不忍睹。

沈阳纺织厂的赵承义向我们叙述了他的弟弟被残害的情景。他弟弟 11 岁时就当了童工，和赵承义在一个工厂干活。一次上夜班，弟弟又饿又困，实在挺不住就打起盹来，这时被日本监工看到，叫来了中国工头，他们用棍棒毒打弟弟。瘦小的弟弟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一起干活的朋友急忙跑来告诉赵承义。赵承义拚命赶到眼前，弟弟已经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日本监工说：“中国人有的是，死一个算什么”。赵承义把弟弟抱起来，弟弟一声没吭就死在他的怀里。

以“捞兔子作战”而闻名的被抓壮丁的牺牲者里，山东省和河北省的人俱多。崔振英就是其中的一名。当时，日军采用这种办法，把中国人强行带上奴隶船。一是到处去抓，然后集中到一起送上船；二是日军给各村地主分配名额，由地主给送去。后者，往往是被骗而去，根本不知道要被送到日本去。崔振英是被通知“到北京去干活”从长工中挑选出来的。当坐上货车被运到天津港时，才发觉上当受骗，但已经被绳子绑起来逃不掉了。和那种从非洲穿越大西洋运送黑人的奴隶船一样，是条件十分恶劣的小型运输船。“奴隶”们同煤炭一起被装上船，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才到了门司。这期间，已有十分之一的人忍受不了恶劣的环境而丧生。尸体被拖到甲板上扔到大海里。活着的人被送到九州的煤矿里

干苦力，每天从事着重体力劳动，直到日本战败。崔振英干活的煤矿里大概有 1500 名被抓来的中国劳工，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 700 人左右。

在上海市港务局第 5 作业场工作的宋继泉向我们述说了他亲眼看见的日军虐杀他的同胞的事情。日本为了铸造兵器，从中国各地征收了大量的铜货币，堆在码头上装船。一个来这里装棉花的拖拉机司机，挟起一块掉在地上的铜币，放进口袋里，被日本监工发现了。这个司机被绑到附近的水道管子上，日本人命令在场的工人们搬来一块大石头，绑在那个司机的身上，从岩石边叫来一艘小船，把司机放到船上，自己也上了船，划出 200 米左右，岸边的工人都说：“这下可没救了”。开始，日本人手里拽着绳子的一头，把司机沉到水里。过两三分种后，再把他拽出水面。那个司机还活着，手脚还在动。然后，再沉入水中，过一会儿再拽上来。就这样，反复多次，让他受尽折磨。宋继泉说，最后那个司机再也不动了，日本人放开绳子，司机沉到水里。

住在上海西郊外的金月妹，家里有 19 口人，其中 17 口人被日军杀害了，只有她和她的弟弟活下来。芦沟桥事件后，日军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1939 年 11 月，开始攻击上海。上海周围的农村被日本兵践踏得破烂不堪。一天，6 个日本兵撞进金月妹的家。当时，19 岁的金月妹住在别人家里，他父亲外出当劳工，也不在家，只有她的母亲和兄弟，还有她的伯父、伯母等一共 17 口人在家。日本兵把金月妹的堂兄嫂子（当时 26 岁）和邻居家一个 16 岁的姑娘，拖出去轮奸后，

还威胁说：“就呆在这，要是逃跑了就别想活命了。”

当天，这伙日本兵撤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她家中，发现那个邻居的姑娘逃跑后，就把全家人拖到院子里，排成一排，用刺刀和手枪全都给杀了。当时，金月妹的弟弟（16岁）躲过日本兵的眼睛，逃了出来。堂兄有个出生4个月的婴儿，被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挑起，扛在肩上，还唱着军歌，耀武扬威地走了。后来，当劳工的父亲也被日本兵刺透眼珠，给杀害了。金月妹说起当时的惨景，不禁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和金月妹同村的马林英的母亲也被日本兵杀害了。当时，马林英的父亲被抓去当劳工，马林英只有9岁，她母亲带着他们5个孩子投奔到3公里以外的亲戚家。一天，孩子们吵吵肚子饿，她母亲拿着一块钱，想去买点米来给孩子们做饭吃，就朝附近的商店街去了。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回来。5个孩子担心母亲的安危，就去商店街寻找。到那里一看，街道被日军破坏得不成样子，很多尸体躺在路上，米店也关着门。5个孩子在一个院子里尸体堆里，找到了母亲。她两只手被绑在后面，仰面躺着。5个孩子一下子扑到母亲身上，大哭起来。

（晓光译）

万人坑

(日)本多胜一

在侵华日军的统治下，中国的东北变成了暗无天日的黑暗世界。其中最集中、规模最大而且有组织地进行残酷迫害的，要属大工地和大矿山。在这里，集中了大批中国的劳工，被迫强制劳动。除东北地区外，还有山东、河北等省。集中的方法多种多样，有欺骗农民可以“吃得饱”；“募集”而来的，有通过和日军关系密切的傀儡地主按村分配名额而来的。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抓犯人”。吃白米饭的，就以“经济犯”为名逮捕，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就以“政治犯”为名逮捕，可以毫无理由地只要看着你不顺眼，就可以随便把你抓起来。

这些被抓起来的劳工，从日出干到日落，被榨干身上的血汗。吃饭只能分到一点像豆渣样的东西，不久，便得了慢性营养失调。因劳累过度倒下去，也有被活活打死的。我采访的大石桥菱镁矿，那时每天都有四五人这样死去。最多的时候，一天四五十人被迫害死。那些被残害的劳工，或者还活着但已经不能动的人，被随便扔掉，尸体堆成了山。这就是“万人坑”。在大石桥有三个“万人坑”。我所见的“虎石沟万人坑”，据推算，大概有 17000 具遗骨。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像平顶山这样“3000 人的虐杀事件”也许有人能不加思索地说这是没有的，但是“万人坑”却不能。这是日常的虐杀事件，每日每天不间断的虐杀的结果，就形成了“万人坑”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尸骨山。

据说，东北地区和苏联接壤的边境的某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日军要塞建设之后，从事这一工程的中国劳工数万人，为了保守秘密，而被全部杀害了。抚顺煤矿据说有 30 个“万人坑”，一个“万人坑”是一万人的话，就有 30 万人。40 多年被日军占领下的煤矿，这个数字决不是“白发三千丈”这种夸大的描写。从大石桥的例子当中，我们大概能够理解。

但是，对我来说，更令我吃惊的是，像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战争已过去二十多年，仍然没有向普通的日本人讲清楚，只能看到一些有良心的原日本军人写的片断回忆。侵略军到底是什么？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我们的父兄参加了的“侵略军”到底干了些什么的问题。要想了解事实的真象，首先必须从自身开始进行，否则，是不能期待有什么切切实实的结论的。

参观“万人坑”时，最让人感动的是“不忘阶级苦”这幅大写的标语，它向我们叙述了这个悲剧，这个人间地狱。过去，我们的生活里之所以那么悲惨，这是因为权力不在我们人民手中，而在侵略者和地主、财阀手中。问题的根源是阶级斗争。如果说“可恶的是日本人”的话，就同现在的美国国内的心理作战一样，人民之间对立起来。本来应该手拉着手，被统治阶级所操纵、所分裂。中国的领导

者，在这一点上是严加防备的。

“万人坑”里摆放着参观者送的花圈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标语。造成民族悲剧的真正原因，不是全体日本人，而是剥削、压迫阶级同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教育到处可见。

然而，“万人坑”是怎样形成的。原刑务所和劳工宿舍的地方，建成了“阶级教育馆”。里面陈列着许多矿山的历史资料，向人们控诉着血泪的事实。

我们一边回顾阶级教育馆展示的资料，一边通过傅崇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当时的情况。傅崇山在阶级教育馆向参观者讲述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矿山的历史。

傅崇山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农民家庭，15岁时被迫给地主家当长工。他白天干杂活，晚上推磨磨豆子做豆腐。本来是用马来拉磨的，而15岁的傅崇山被用来代替马拉磨。

十几年过去了，一天，家乡遭了水灾，在这里继续呆下去只能饿死，他只好带着老婆、孩子背井离乡。当时，大石桥的菱镁矿正在河北省一带募集“劳工”。招工告示上写着：工资高、吃白米饭、住好宿舍等等。

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们，尽管半信半疑，但一想，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可实际上，他们签的契约是一张卖身契，意味着把自己卖给了矿上。

用这种方法，从全国各地招来的劳工被集中起来，送往大石桥煤矿。在天津站，劳工们被塞进货车，车门被反锁上，同押送牲畜一样，大小便只好在车厢里。就这样，傅崇山一

家也被骗到了大石桥菱镁矿上。真是刚刚逃出“火坑”，又跳进“虎口”。

中国人的命还不如矿石值钱，为了多采矿，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强迫劳工上下两层同时作业。许殿波的哥哥，就是在这种野蛮作业的现场干活时，被落下的石头砸死的。

劳工们从来不发给衣服，只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和鞋干活。

与一般劳工相比，刑务所的“囚犯”们受着更加惨无人道的迫害。当年，刑务所的四周架起双重的铁丝网，还通着电流。矿山所发生的无数悲剧不能一一记录下来，其中的一少部分，被做成泥人雕塑展示在阶级教育馆里。有这样一组雕塑，讲的是一位母亲带着幼女，千里迢迢来看望被抓进刑务所的儿子。刑务所的警卫不但不允许她们母子相见，还抢走了她身上仅有的一点点干粮，然后把母女俩赶走了。母女俩饥寒交迫，无处栖身，不久就饿死在荒郊野地里了。而她的儿子，因为每天只配给少量的稀饭，从早到晚不停地干着重体力劳动，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就把石粉掺在粥里喝进去，一天干活时，他的肠子穿孔当场就死了。

在日本工头眼里，中国人的性命只不过是“消耗品”。每次事故发生时，机械设备和矿山总是优先于人命。有一个雷雨天，为了防止雷电击中变电所，在作业当中，在没发出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切断了电源，10多台连结在一起的满载着矿石和矿工的输送车，一下子翻了个底朝天，当场就砸死 40

人，砸伤 100 多人。

除了每天饿死和拷打致死的以外，还有一些是被监工们故意折磨死的。有一个姓崔的劳工，背后曾说了些对监工不满的话，传到日本监工耳朵里后，日本监工把一块巨大的石头放在他背上，命令他背起。他终因坚持不住，被大石头压死了。被抓到刑务所里的人，几乎都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或是有抗日游击队嫌疑的人。

在这个“人间活地狱”里，也存在着反抗斗争。一组雕塑展示在我们面前，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汉和同伴们一起准备逃走计划暴露后，为了保护同伴，老汉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抗日游击队。老汉立刻被绑在电柱上，监工们用鞭子抽他，用烧红的铁钎烫他。严刑拷打之后，往他身上浇了大量的水，当时正是严冬季节，他被冻成了“冰人”。

尽管这样被残害致死的人很多，但劳工人数并不因此而减少，因为不断又抓来新的人进行补充。假如一天有 20 人被扔进“万人坑”，一年就是 7300 人。一个“万人坑”是一万人的话，大石桥的三个“万人坑”大概需要 4 年左右的时间就填满了。

被扔进“万人坑”又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的张永锦，当时只有 14 岁，作为童工来到矿山。由于忍受不了沉重的劳动，一天夜里，他偷偷地爬上山准备逃走，被发现后，给抓了回来，监工用镐打得他浑身是伤，奄奄一息。监工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扔进“万人坑”。深夜，他苏醒过来，从死尸堆里爬出